

第一章 孔子与中国古代学术

第一节 出土文献与孔子尽善尽美的审美思想

一、出土文献与孔子地位的再确认

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学者，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孔子的教学活动培养了中国文化史上最早的人文学者；第二，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建立的基础。孔子是一个教育家，孔子教学，有教而无类，“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①，招收学生，不论等级，使普通平民通过学习可以成为文学之士，在社会中谋求到自己的生活地位，所谓“虽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②，如孔子的学生“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③。这种私人讲学风气，在孔子弟子那里，仍然得到继承，因此更多的出身庶人皂隶工商之贱人，通过努力学习而成为文士，最终投身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事业。

① 《荀子·法行》。

② 《荀子·王制》。

③ 《荀子·大略》。

孔子在培养弟子的时候，不仅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积极进取、善良正直的人格。孔子常常以成为“士”、“志士”“士之仁者”来期许学生。孔子指出：“士志于道。”^①“行己有耻。”^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③孔子弟子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④孔子弟子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⑤在孔子及其门人弟子的心目中，“士”应具有学识、志向、道德、仁义忠信、勇敢的品质和才能。士的志向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于水火，对天下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同时又注意自身才能、智慧的培养。正是这种新士风，造就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这种强烈的责任心和现实使命感，既表现为对现实政治的参与，也表现为通过著作来拯救现实社会的文化活动。

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建立的基础，最突出地体现在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上。六经是孔子以前中国文化的结晶，而不仅仅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庄子·天下》云：“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道家的重要代表

① 《论语·里仁》。

② 《论语·子路》。

③ 《论语·卫灵公》。

④ 《论语·泰伯》。

⑤ 《论语·子张》。

庄子不仅指出了六经的经典地位，同时对六经的内容也作了精辟的概括。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我们从《左传》、《易传》、《论语》、《孟子》、《荀子》、《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等传世文献书中是早已了解了的。孟子云：“圣人之于民也，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① 圣人之传承，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再至孔子，一脉相承，而孔子又为最盛，孔子岂是浪得虚名？孔子居仁行义，为政以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故近世儒学宗师马一浮先生学际天人，贯通中西，然后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的论点，认为“圣人往矣，其道则寓于六艺，未尝息灭也。六艺是圣人之道，即是圣人之知，行其所知之谓道”，《诗》教主仁，《书》教主智，合仁与智，则为至善；《礼》是大序，《乐》是大和，大序大和，合为至美；《易》穷神知化，显天道之常，《春秋》正名拨乱，示人道之正，常之与正，合为至真。^② 孔子及六经所具有的现代意义是孔子在二十世纪应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根据。然而，正如孟子所言：“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③ 《汉书·艺文志》也说：“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孔子本意，至孔子弟子之后而不传，近世之人怀挑剔之怨望，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自所难免。由于对孔子的本意不能洞察，对孔子的重要性认识

① 《孟子·公孙丑上》。

② 《泰和会语》，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1996年版。

③ 《孟子·尽心下》。

不足，随着岁月的流逝，对孔子的思想实质出现了有歧义的解释，孔子与六经的权威性也就发生了动摇，因而就有了否定孔子的绝对权威，进而渐渐出现否定孔子与六经关系，否定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的言论，而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更是将这种倾向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境地。

事实无情。当我们在检阅出土文献的时候，我们发现孔子与六经及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和重要得多。如《论语·述而》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汉书·艺文志》曰：“《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迹，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古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宋人欧阳修怀疑《易传》与孔子的关系，到了近代，怀疑者更多，如钱穆、李镜池等人都撰文予以说明，认为《论语》中的五十学《易》为不可靠，否认《易传》和孔子的关系，钱穆先生为此提出十个证据，其中六个证据证明孔子不作《易传》，另外四个证据“要更进一步说，孔子对于《易经》也并未有‘韦编三绝’的精深研究，那孔子作《十翼》的话自然无根据了。”^①马王堆帛书《易传》之《系辞》、《二三子》、《易之义》、《要》、《繆和》、《昭力》的出土，使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变得明晰起来了。帛书《易传》为孔子易说，而今本《易传》，虽然有部分后人杂入，但《乾文言》、《坤文言》、《系

^① 参见钱穆《论十翼非孔子作》、李镜池《易传探源》，载黄寿祺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辞》的主要内容皆为孔子所作，已可作定论。^①

又《史记·孔子世家》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汉书·艺文志》曰：“《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王充《论衡·正说》曰：“《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篇。”后世学者则有人断然否定孔子与《诗经》的联系，否认删诗的可能性，因为今日所见逸诗不多，殊不知三千篇中多有重复，而被删之诗，其引用的概率必然较低。《国语·鲁语》载孔子先祖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有人怀疑《商颂》为春秋时宋国人正考父颂扬宋襄公的作品，而司马贞《史记索隐》指出宋襄公晚正考父一百余年，杨公骥教授《商颂考》据此考证《商颂》为商朝作品^②，论证绵密，足可谓不易之论，而今《诗经》有《商颂》五篇，则《商颂》之被删，且幅度之大，于此可见一斑。由此可知，《诗经》中的作品，原不止现在之数，其形成过程中经过删节也是无疑的。近年上海博物馆收集的战国竹简共有一千二百多支，字数在三万五千左右。竹简涉及到八十多种（部）先秦的古籍，其中孔子或子夏的《诗论》，在以往的古籍中未见记载，而竹简中首次发现的一些诗歌，并不见诸《诗经》，但艺术风格与《诗经》颇

^① 参见郭沂《从早期易传到孔子易说——重新检讨易传成书问题》，《国际易学研究》第三辑，华夏出版社 1997 年版。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杨公骥《商颂考》，见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为相似。另外，如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之《缁衣》^①中，既有三百篇之诗，也有逸诗。因此，我们相信以后的出土，还会发现新的逸诗，则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也一定比我们今天所可以确认的要更加密切。

二、出土文献与孔子的大同理想和公羊三世学说

孔子地位的确认，既依赖于对孔子与六经的联系之重新确认，更依赖于对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的挖掘。出土文献不仅仅让我们重新恢复孔子与六经联系之信念，也对于我们认识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有新帮助。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提出大同理想：“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焉，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功，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政者，

^① 《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众以为殃,是谓小康。”所谓大同,就是人人一切平等,就是民主政治,而孔子之赞扬尧舜禹的圣治,就是赞赏民主,如《论语·泰伯》之言“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则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指出原始氏族社会的特点是遵从天的平等公正,而“不与”,即“无为”;也就是说要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与此相对应,孔子对小康之世存有批判,天下为家是专制主义的特征,与大同背道而驰,所以孔子深为不满。今人多强调孔子欲恢复周礼,周礼所代表为小康政治,与民主政治相反,殊不知孔子的最终理想是实现大同,他希望在礼崩乐坏的环境中,通过恢复周礼,为大同理想的实现积累基础,通过礼制秩序的建立,由德治最终发展为自然之道治。

孔子的大同理想,在后代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是源于人们怀疑《礼记》作为先秦典籍的可靠性。近年郭店楚简出土的诸儒家典籍,不仅有《礼记》中的大量篇章,而且,有一些传世文献所不载的儒家文献,后者使我们清楚地发现了儒家限制君主官吏的权利,倡导君主官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论述禅让思想的《唐虞之道》更可以作为孔子后学发挥孔子仁爱民主平等思想的纲领。《唐虞之道》以禅让为大仁大义大圣,曰:“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有天下弗能益,亡天下弗能损,极仁之至,利天下而弗利也。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教而化乎道。不禅而化民者,自生民则未之有

也。’^①在这里,作者把‘仁’‘义’‘圣’与天下为公的大同‘禅让’的理想结合起来,并认为真正的治世的到来必然依赖于建立“禅让”的民主政体,这就使‘仁’所具有的自由精神就更加清晰,从而也证明孔子及儒家思想决不是维护政治的专制主义体制的,而是把实现大同看作是最后的归宿。

在专制时代开始以后,能准确把握孔子思想精粹的,首先是西汉儒生,其实践就是鼓吹禅让,并最终在王莽时代付诸实施。不过,西汉的禅让之弊在于缺少禅让制度的逻辑发展过程,因此,虽然有禅让之名,却没有大同之实。近人康有为标榜民主革命,以现代西人民主解释孔子的大同理想,则深得孔子理想之三昧。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首先标榜‘爱’,也即孔子所说‘仁’,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大同书》说:‘不忍人之心,仁也。’《孟子微》说:‘一切仁政,皆从不忍之心生,为一切根一切源……太平大同,皆从此出。’康有为认为,只要从博爱的立场出发,就可以产生平等、自由、民主诸观念,进而实现世界大同。这与孔子的逻辑线索一致。康有为把何休在解说《春秋公羊传》时提到的‘公羊三世’与‘大同’‘小康’之说联系起来,认为‘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此为《春秋》第一大义’^②。在孔子看来,先有大同,其次小康,其次乱世,这是一个社会自觉退化的必然环节,而要拯救退化的社会,不可能直接由乱世实现

① 《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② 《春秋董氏学》卷二,《康有为全集》第2册。

太平，而应该以渐变的步骤，通过克己复礼实现小康，再至太平。孔子欲由乱世而至小康，再由小康而至大同，是一种科学的符合人类内心诉求，符合现代人文精神的社会发展理想。康有为正是清楚地体会到了孔子的用心，而认为专制主义必将走向立宪政治，最后走向共和政治，实现人类真正的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独立。

三、孔子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的新阐释

在对孔子的思想有了以上的认识以后，再来挖掘孔子文学艺术观中的人文精神，我们就会有更深入一步的看法：孔子把他对大同的渴望，贯彻在他的审美理想中，他对文学艺术的最高要求，既表现为对美的重视，更表现为对善的重视，而善，既有普通意义的善，又有以至善为最终追求的善，而至善就是要体现大同意志。

孔子论文，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和协调发展，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①，但是，对于创作主体而言，形式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所以，孔子说，“辞达而已矣”^②“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③孔子强调文学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功能^④，就是强调文学内容的强大社会力量。孔子赞扬《诗经》三百篇的“思无邪”^⑤，其立论的基点也是建立在对文学艺术作品内容的善的重

① 《论语·雍也》。

② 《论语·卫灵公》。

③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④ 《论语·阳货》。

⑤ 《论语·为政》。

视方面。追求善，戒除不善，是孔子及其门人一向的追求。《论语·述而》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季氏》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孔子对善的追求，对不善的警惕，在这些论述中已一览无余。正像孟子所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① 积极于善，与人为善，必然归结为追求大同；反大同，必然与人为恶，屈服于私利的驱使。所以，孔子赞扬善，与他赞成大同，正体现了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孔门对善的重视，也体现在《易传》之中，《易传》是孔子及其弟子阐述其思想的重要著作，其强调善，也与《论语》无二，《坤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有》象曰：“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益》象曰：“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系辞下》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孔子对善的追求，体现在他的审美理想之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善，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来讲，就是强调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容的至高无上地位。一切文学艺术作品，其最终的归结点，绝不仅仅是文采的愉悦，形式的超凡脱俗，而是对人的关怀，只有善，才是符合人文精神的追求。

孔子对内容的善的重视，是所谓“尽善”。《论语·八佾》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

^① 《孟子·尽心下》。

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在这里，孔子所以强调《韶》的尽善尽美，就在于《韶》体现了大同理想，而《武》却无此精神，所以有美而无能至“尽善”。也就是说，文学艺术作品到达‘尽美’的高度，并不是顶点，还应该再向前走，就是达到‘尽善’；‘尽善’就是文学艺术作品必须体现出大同的精神追求，文学艺术作品只有在内容上体现出“尽善”的高度才是符合孔子审美理想的终极追求。

正因为孔子认为《韶》体现了他的大同的审美理想，所以，孔子对《韶》的赞扬还有不少，《论语·述而》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卫灵公》云：“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①。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云吴公子札在鲁观乐：“见舞《象箛》《南箫》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帟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象箛》、《南箫》为颂扬文王之乐舞，《大武》为武王之乐舞，《韶箛》为汤之乐舞，《大夏》为夏禹之乐舞，《韶箛》为虞舜之乐舞。季札是孔子理想所寄托之人，其审美判断同样折射了孔子作《春秋》的意志。

应该注意到，孔子所赞扬的，并不是《韶》这样的体现大同理想的乐舞等艺术形式本身，而赞赏的是其内容所体现的大同的

①舞通武。

价值。夏之时，殷之辂，周之冕，不过是器用，则后来者居上，而乐舞则关乎人之精神大局，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①，所以，乐舞则非《韶》、《武》不可，而《韶》代表了大同之精神，《武》则代表了实现大同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所谓小康时代的精神追求。

四、尽善尽美的人文意义及徵圣宗经的积极性

孔子陶醉于《韶》，绝不仅仅缘于其形式是‘尽美’而在于其内容之“尽善”。而此“尽善”，不可以简单化地理解为是相对的善，而应该看作是绝对的善，即人类对理想化社会的终极追求，应该认识到它与孔子大同理想的密切联系。如此，我们就知道，孔子的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追求，而体现的是他对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处境的一种人文关怀。所以，文学艺术活动必须关怀人的生存境遇，没有人文关怀的文学艺术作品，其存在是没有价值的，这是孔子的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给我们的启示。

孔子的文学艺术观，把人文关怀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不仅如此，孔子认为，一切治学，至善才是最后的追求，《礼记·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处对“止于至善”的强调，正是对孔子思想的精确把握，而“明德”、“亲民”，正是“止于至善”的最好注脚。孔子的人文关怀，体现在他著作的《春秋》中，《孟子·滕文公》说孔子做《春秋》的动机时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董仲舒则指出：“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

^① 《论语·泰伯》。

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以深切著明的行事，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①。孔子意欲通过著述的形式拯救社会，其著作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孔子在阐发六经内容时，也是从人出发，《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其所标榜，在于培养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的人格，欲人之不贼，不诬，不奢，不愚，不烦，不乱，而养志知事，行端性和，明乎阴阳名分。六经为孔子所厘定，孔子是六经精神的最初的最权威的诠释者，其所阐述的六经关怀人的主旨，正是中国后代文化学术发展的方向。《孟子·滕文公下》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诋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正是孔子作《春秋》的精神。

由于孔子的审美追求符合人类的终极理想，而六经又贯彻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了孔子所一向倡导的人文关怀的精神，因此，尊崇圣人，学习六经，就应该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趋向。如《荀子·儒效》曰：“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荀子之言诗言其志，指的是《诗》为圣人人格之表现，此与《尚书·尧典》宽泛地说“诗言志”不同。王先谦《荀子集解》曰：“国风所以不随荒暴之君而流荡者，取圣人之儒道以节之也。”也即《毛诗序》之“发乎情，止乎礼义”。“文”指文饰；“光”者，广也；“至”指“盛德之极”。在荀子看来，《书》、《礼》、《乐》、《春秋》其言事、言行、言和、微隐，与《诗》之言志相为表里，构成一个圣人人格内容与形式的大系统。文学艺术正是养成圣人人格内容与形式的途径之一。《荀子·劝学》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书》之政事，《诗》之情态，《礼》之行为纲纪，《乐》之中和，《春秋》微言而大义，可以教导人超凡入圣，最终走向善，所以是学习的最高典范。荀子发现了圣人孔子是人类智慧的集大成者，五经是圣人智慧所具有情志文采的完善体现，所以学习必须以圣人及圣人创设的经典为根据

学习的目的是成为圣人。荀子的徵圣宗经观点，建立在六经内容的纯正，形式的清约简丽基础上。因此，在战国时代产生的徵圣宗经的观点，其出发点在关怀人，其客观成效是促使文学艺术作品更加具有人文关怀的情结，其出发点和客观成效，都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节 孔子及其后学思想与自由主义精神

一、挖掘孔子及其后学思想的自由主义精神的意义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抓住了近代人类文明的最为核心的成果，这就是他认识到了“自由”在民主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性。为此，他认为，首先，自由乃天赋人权，是每个人应该拥有的天然权利，所谓“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①。其次，国家的富强有赖于自由，“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得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得皆得自由始”^②。第三，自由是西方文明，西方世界由于人人各得自由，所以国也各得自由，法律政治的设立目的就在于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也各得自由，……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③。而中

① 《避韩》。

② 《原强》。

③ 《论世变之亟》。

国历史既欠缺自由精神，中国的圣贤也没有意识到自由对人民与国家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严复关于自由的重要性的看法，抓住了西方近代文明的精髓。而严复关于自由意识在中国历史中的欠缺的观点，也是大部分人所认同的思想。在中国最近几十年中，由于种种原因，自由和自由主义被当作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受到了某些权威的排斥，而学术界也一向不敢对自由及自由主义进行仔细研究，更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在孔子及其后学及中国传统思想中，实际存在着追求自由的人文精神，并且这种精神是孔子及其后学思想的最高理想和最后追求。也正因此，当代政治家和研究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的人，也往往以为中国或东方的传统是专制主义，自由或自由主义的观念只存在于西方。因此，某些政治家认为自由或者自由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人缺少自由或者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这些认识的产生，对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正确的未来人文精神，都是有害的。本文意图通过对西方自由和自由主义概念的描述，来挖掘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且要说明自由主义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核心。

二、自由及自由主义的内涵

所谓自由，就是每个人都享有按照自己的道路去追求自己的好处的权力。按照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的论述，人类自由的领域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思想和感想的自由，即有权力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二，趣味和志趣的自由，只要无害他人，即使是愚蠢、背谬、错误的，也不应受到妨碍；第三，个人间相互联

合的自由，只要无害他人，不是被迫或受骗。^① 这些原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民主国家在宪法中公开承认的人权的基本内容。而要实现自由，需要恪守两条原则：“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若为着自己的好处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远而避之，这些就是社会要对他的行为表示不喜或非难时所仅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担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他自己的话。”^② 也就是说，你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却不能因此损害他人的自由。

自由和自由主义是互相联系的概念，只不过自由主义比自由的内涵更加丰富。自由主义者的观念中包含了自由观念、平等观念、民主观念、博爱观念等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民主、平等、博爱观念的中心，就是要保证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享有自由的权力。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是目的，而民主、平等、博爱等观念正是实现自由权利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自由主义伴随着反对专制主义的运动而兴起，它的基本原则是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力，因此，自由主义是与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追求个性自由，摆脱习俗、权威和法律的约束，把人从禁锢和屈从中解放出来，即保护个人不受无理的外界的迫害，是自由主义的最基本的内涵。

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与西方文化的发展同步的。《简明

① 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2 至 13 页。

② 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02 页。